

雅洪托夫 (1926-2018)

远藤 光晓

余霭芹教授传来雅洪托夫教授 2018 年 1 月 28 日逝世的消息。收到邮件的头几天我正在编纂《唐宋汉语文献目录》，要上网确认 Яхонтов, С. Е. (1980) Пекинск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XI в. 的信息，得知由 Е. Н. Колпачкова 女士等编纂的 90 岁诞辰论文集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К 90-летию С.Е. Яхонтова*. (СПб: Студия «НП-Принт», 2016)公开发表在网上: <http://www.orient.spbu.ru/books/k-90-letiyu-Yahontova/>。我于 1989 年 9 月和 1992 年 9 月分别在列宁格勒和奥斯陆见到过他。第一次见面时的记录《ヤーホントフ教授を訪ねて》发表在日本内山书店《中国图书》2 (4), 2-6, 1990 年; 收录在《汉语方言论稿》328-331, 东京: 好文出版, 2001 年。这里把全文翻译成汉语, 以志纪念:

《雅洪托夫教授访谈录》

列宁格勒大学的雅洪托夫教授 (1926~) 在中国语言学各方面都有着非凡、富有建构性逻辑的业绩, 从现代语法和上古音开始一直到古代语法、近代音、方言学、汉藏语比较研究等都做过独一无二的工作。也许在这些领域中还能分别举出别的专家, 但他的独特贡献几乎涵盖中国语言学的全部。从这意义上说, 在高本汉和赵元任已不在的现在说他是世界中国语言学家的最高峰或许也不过分。对我而言, “雅洪托夫” 这一名字像黑天中闪烁的闪电, 甚至是一种启示。这次有机会访问当地, 与他见面, 在此介绍他的为人。



雅洪托夫教授 (右上角的照片是龙果夫)

1989 年 9 月 12 日, 他在东方语文学院门口接我。本来预料他是个锐利的人, 但见面后恰恰相反, 他像个满面春风、和蔼慈祥的爷爷一样。他带我去看中文系的教研室, 这里小而简朴, 从窗户能望到阳光灿烂的涅瓦河, 墙上挂着 19 世纪以来至龙果夫的历代教授的照片, 令人感觉到列宁格勒学派辉煌的传统。以下采

访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文责归我，希望无所误传。

——您今年教什么课？

讲授古代汉语语法和汉语史，还有 4 年級的讨论课，每年从汉语方言学、中古汉语语法和中国语言学史三门课中选择当年学生选择的课。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书？

我是 1950 年本科毕业的，也是在那一年，由于我的老师龙果夫改组移到莫斯科的研究所，就接他的班开始教书。那时候一个年级有几十个到一百个学生，虽然过几年就减少到了十几个人。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研究生院的学习，1954 年提交了副博士论文。

——也就是《汉语的动词范畴》（有桥本万太郎日译《中国语动词の研究》，白帝社，1987 年，读到不通顺的地方就可参看汉译），对吧？

对。那时候主要对现代汉语语法感兴趣，之后每年都要担任不同的课，也就涉及到古代语法等等。

——亚非语言丛书中的一本《上古汉语》（*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含有节译）是那时的研究成果吗？

没错。那是 1960 年写好了的，但到 1965 年才出版。副博士论文因为是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就立刻出版了。从那以后只发表单篇论文。

——1960 年是《上古汉语的复辅音》（该著名论文把复辅音的第二成分 1 和二等介音联系起来，并指出双唇音以外的清次浊音；但还有马伯乐 1930 年的先驱业绩）发表的年份。

在上古音方面，1956 年讲授《上古汉语语音学》。到了 60 年代，从 1967 年开始转到亚洲各种语言。

——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内在必然性促使您把向来的研究扩展起来吗？

不，不，那年教研室改组，开始包含缅甸语、越南语等东南亚语言，身边的人也就改变了。我平时就想研究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最近兴趣开始转向中国北方各民族语言的历史。不过，迄今为止只发表了一篇有关吉尔吉斯族的历史，只有写了四、五篇论文才称得上“主攻方向改变了”。那也是因为我的同级同学突厥语专家 С.Г.Кляшторный 常常问我问题，就开始感兴趣。1945 年入学的学生因为是战后第一批招生，所以同级同学特别多（苏联的大学是 5 年制）。

——您学生时代上过哪些老师的课？

最主要的老师还是龙果夫。有中国语言学导论课，另外语法方面的课很多。上古音没上过课，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学的。还有 А.А.Холодович 老师，他传授日语和朝鲜语以及普通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最近出版了 4 卷本《汉俄大词典》，是 В.М.Алексеев 院士从战前已经开始准备的。当时是斯大林时代，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东方学、语言学和列宁格勒案件三项斗争，于是那些比龙果夫年长的老教授们都被辞退了（实际上，他还更加详细地讲述了这些斗争的结果，输的方面都被枪毙了等情况，在此不记。《证言：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日译本现收在中公文库）记载了知性敏锐、感性细腻的人在这种时代经受何等煎熬，可聊以窥测在同一地过了同时代的雅洪托夫教授心中的感受）。

——没上过波利瓦诺夫的课吗？

根本不可能。他在 1938 年早就死在监狱中了。

——啊，真的。我以为波利瓦诺夫、龙果夫和您在列宁格勒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龙果夫说他的老师是谢尔巴。对了，比龙果夫早一任教授 Ю.К.Щуцкий 曾在少年杂志 *Костёр*（少先队的“篝火”）连载语言学讲座，我少年时读过。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被肃清，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另外，我也上过一位叫黄先生的老师和实验语音学专家 А.Г.Шпринцин 老师的课。

——虽然没有直接教授过，但学术上受到影响的人还有哪些？

那还是高本汉。从龙果夫老师那里借来阅读他的书。王力和吕叔湘的书是稍后阅读的。另外，我还喜欢读奥德里古尔的论文，并在莫斯科的国际会议时见到过他一次。还有，1962 年秋到 1963 年暑假前我在北京大学呆了一年，在那里上过朱德熙老师的课。

——那时您的副博士论文汉译本已经出版了。再说，您和朱先生年龄相差不远。

仍然算是师生关系。对了，朱德熙在保加利亚时编过一部汉语课本，其中语法部分引人注目。不过那是保加利亚留学生给我看的，我手头也没有。还有，那年王力没上课，吕叔湘属于科学院，因此没直接受教。也上过陆俭明和唐作藩的课。

——唐作藩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的导师，曾经谈起过您。最后，您在这几十年来教过的学生当中有哪些杰出的人？

李福清在莫斯科的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文学，列宁格勒有 И.Т.Зограф 女士（中古汉语专家，主著 *Средне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中古汉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以下没有注明时都是该出版社出版），1979 年；*Монголь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интерференция*《蒙古语和汉语的接触》，1984 年等）。研究西夏语的 К.Б.Кепинг 女士（主著 *Тангутский язык: Морфология*《西夏语形态学》，1985 年）比我有名呢。

——Кепинг 是年轻人，对吗？

那当然。女性永远是年轻的。还有，Н.А.Спешнев 最近以中国俗文学取得了博士（*Китайская 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中国民间文学》1986 年，还有 *Фоне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汉语语音学》，ЛГУ（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80 年）。另外，搞古代汉语语法的 Т.Н.Никитина 女士，台语比较语言学的 В.И.Гохман，晚期上古汉语语法的 И.С.Гуревич 女士（*Очерк грамма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III-V вв.*《3-5 世纪汉语语法论考》1974 年；还有与 И.Т.Зограф 合著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III-XV вв.*《3-15 世纪汉语史资料选读》，1982 年）等，另外还有由于你原先熟知就没提到的 О.И.Завьялова 女士（专攻汉语北方话和东干语，主著 *Диалекты Ганьсу*《甘肃方言》，1979 年；还有 Е.Б. Астрахан, О.И. Завьялова, М.В. Софронов 合著 *Диалекты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в Китае*《汉语方言与普通话》1985 年；由于曾经长期居住在东京，因此有密切来往，这次和雅洪托夫教授访谈也是由她安排的）当然也是。

谈完后，他说因为顺路就把我送到下一个目的地东方学研究所。来时他的儿子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君把我送过来，三个人沿着涅瓦河一边走一边聊天。虽说还是 9 月，北

方都城列宁格勒已经有晚秋初冬意，薄薄的阳光下凉爽的空气非常怡人。于是问起一个很直率的问题：“什么因缘使您开始专攻汉语？”他先开玩笑地说：“当时东语系有印地语和汉语两个专业，报名排队时，我后面的同学被告知汉语专业的 20 个名额已经满了，只能报印地语专业了。如果那时我到办公室差几秒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和你谈话了。”接着说：“我本来对语言感兴趣，但估计靠它无法谋生，就要去当工程师。但是到了 1945 年战争结束，感到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时代来临了，就选择了难度最大的语言——汉语。像英语等等，随便在这里找带眼镜的行人问起‘Do you speak English?’，肯定都会回答‘Yes, I do.’，就没什么意思吧？像阿拉伯语、汉语才称得上外语。”

走在旁边的康斯坦丁君刚写好题为《满语的动词范畴》的毕业论文，从这个秋天开始进东方研究所工作，于是我说：“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汉语太普通了，只有像满语那样才会引起知识上的好奇心吧？”他就微笑着。他的千金也在东方学研究所研究蒙古语，看起来，他说开始对北方各民族语言发生浓厚的兴趣，理由也很清楚了。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在紧邻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街道上，曾经是帝政时贵族的宅邸，阅览室的装饰和艾尔米塔什是同一个风格，白垩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挂着吊灯。从那优雅的窗户向列宁格勒大学方向看去，隔着涅瓦河对岸能望到向天巍然耸立着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尖塔。不知有人说过“城市造就人物”没有，这个情景令人感觉到龙果夫等人所散发的具有上升力的逻辑建构性就是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养育的。



括号里的信息是我当时补进去的。现在增补下面一些事情：1) 关于 А.А.Холодович, 菅野裕臣教授翻译了两篇论文，收在《动词アспектについて》I, II, 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29, 35, 1990 年, 1992 年。2) 关于朱德熙先生在保加利亚编的汉语课本，1992 年 9 月去索非亚，在国家图书馆见到原件：Джу Дъ-щи и Джан Сунфън, Учебник по китайски език (图书号码 159034), 见《朱德熙先生のいくつかのこ

と》(《朱德熙先生二三事》), *Tongxue* 5: 13-16, 1993 年; 《汉语方言论稿》325-327, 东京: 好文出版, 2001 年。

说来真傻,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对我的问话“Кепинг 是年轻人, 对吗?”, 他回答说“那当然。女性永远是年轻的。”, 意思是“已经不年轻了。”不过, 由这个很短的机智答话能领悟到他的诙谐幽默, 也不伤害对方, 还尊重女性, 从很高的层面上说出真理, 越发令人敬慕不已。

至于第二次见面, 我在 1992 年 3 月到 9 月游历整个欧洲时的记录《北京からパリへ—ヨーロッパ中国語学の旅》(《从北京到巴黎——欧洲中国语言学之旅》, 内山书店《中国图书》1995 (5): 2-5; 《汉语方言论稿》364, 东京: 好文出版) 有所谈及。现把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3 月 29 日晚上到达奥斯陆。第二天到了奥斯陆大学, 艾皓德先生把我介绍给系主任莫邪先生, 也得知雅洪托夫先生作为客座教授来讲学半年。当天上第一节课, 我也旁听, 是题为 Linguistic Areas of East & Southeast Asia 的视野宏大的内容。休息时间后, 轮到我讲。虽说听众只有 7、8 名, 但都是强手, 真的有讲头。我概括性地介绍了谚文创制 (15 世纪) 以后的朝鲜资料, 雅洪托夫先生补充说, 在那以前的历史书也包含音译资料。”

雅洪托夫教授的论文目录收录在 90 岁诞辰论文集里。下面补充一些外语翻译 (原目录按年份分类, 同一年的论著按顺序加上 abc 等来指称, 罗杰瑞的英文翻译信息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rgei_Yakhontov, Accessed 23Feb. 2018):

(1955b) 唐作藩译, 评王了一《中国语法纲要》, 《中国语文》1955 (12): 42-45。

(1957b) 桥本万太郎译《中国语动词の研究》, 《中国语学》87: 9-17; 89: 12-18; 90 16-20; 93: 13-15; 98: 10-13; 1959-1960 年; 桥本万太郎译《中国语动词の研究》, 东京: 白帝社, 1987 年。

(1959b) Jerry Norman (tr.)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Unicorn* 1: 47-65, 1968.

(1960a) 叶蜚声译《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 北京大学油印本, 1983 年; 叶蜚声、陈重业、杨剑桥译, 伍铁平校《上古汉语的复辅音》, 《国外语言学》1983 (4): 21-25, 40; 杨剑桥译, 陈重业校《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潘悟云编《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291-299,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1960b) Jerry Norman (tr.) "The phonology of Chines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rounded vowels)", *Unicorn* 6: 52-75, 1970; 陈重业译, 杨剑桥校《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 潘悟云编《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301-318,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1965a) chapter 2 (Phonetics), Jerry Norman (tr.) "Old Chinese Phonology", *Early China* 4: 37-40, 1978-1979.

(1980c) 古屋昭弘译《11 世纪の北京語の发音》, 《均社论丛》12: 52-58, 1982 年。

(1983c) Resultative in Chinese,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Typology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113-13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8.

中国学者在文革后接触到雅洪托夫教授副博士论文以后的业绩是通过梅祖麟先生的介绍。1983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了半年近代汉语语法，介绍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等日本学者的研究以外，还讲授上古音，特别推崇雅洪托夫的贡献。

从1982年冬天始，桥本万太郎先生也恰恰在北大，他给北大学者提供雅洪托夫的一系列论文复印件，为编辑《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准备了基本条件。据《汉语的动词范畴》日译本译者前言（第4页），还有计划编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东南亚语言的翻译选集，但后来没有实现。桥本先生和雅洪托夫先生很早就有交流。《汉语的动词范畴》1957年8月出版，雅洪托夫先生就签名赠送给桥本先生。他利用1958年春假翻译全文，1958年3月20日12点19分翻译完毕，共4册笔记本，达400页。当时，雅洪托夫先生31岁，桥本先生25岁。后来长期交换抽印本，到1976年他才有机会访问列宁格勒直接见到雅洪托夫先生。他写道：“…真是‘一见如故’就是这种会面。从第二天开始，正值芳龄熠熠生辉的千金 *Нараша* 也加进来，雅洪托夫一家热情款待的那些日子令我终生难忘。”（《汉语的动词范畴》日译本译者前言第3页。）

余霭芹教授在邮件里说：“I met him only once, in Hong Kong I think. He came up to me and apologized that he could not contribute an article to the memorial volume for Mantaro in time - he was in Singapore at that time and did not receive Endo Mitsuaki's letter until he returned to Russia. I was so surprised.”这也不是偶然，他们两个人是长期以来在最深处彼此沟通的知己。

其实，我见到雅洪托夫先生时还有一段话在访谈录上没有写进去：我向他提议在中国出版他的全集。但他引了中国古典的一个故事（见附记）说，这种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坟墓上却早就长了粗大的树。这也是一种把自己戏虐化的高雅的婉拒方法。当时我不知道还有编民族语言选集的计划，所以天真、冒昧地这么说。但确实还有许多大家都还没能接触到的各方面佳作。

可是我1980年刚上硕士课程的那一年，申请从列宁图书馆拿到日本罕见的龙果夫“*A Persian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Mandarin*”，*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7: 359-375, 1931的时候，哪里能料到36年后竟在龙果夫和桥本万太郎先生灵魂的帮助下完成 *Tanksuq-nameh* 的波斯-汉对音资料的研究，并出版《元代音研究——〈脉诀〉ペルシヤ语译によ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也不一定是我，但总希望有人到他的长了大树的坟墓去奉献他的中文版全集。

附记

本文请 *О.И.Завьялова* 女士和孙伯君教授过目，校改多处，谨致谢忱。孙教授还加了按语：雅洪托夫教授的用典应该是“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

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意思是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活到一般人的岁数（中寿），你的坟墓上的树已经长到两手合围那么粗了。”这句话本来是骂人早死的话，雅洪托夫先生在这里用的意思应该是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即“等到那一天，我坟墓上的树早就两手合围那么粗了。”

孙伯君教授在北京接待过雅洪托夫教授的千金 Наталья Яхонтова，她带着她父亲 60 年代初期带回去的北京地图，但是 21 世纪的北京完全改变了模样。这个有趣的故事（她是多么忠实于父亲的女儿啊！）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O.И.Завьялова 女士是雅洪托夫教授在汉语方言学领域的接班人。她早年的论文 Zavjalova, Olga, A Linguistic boundary within the guanhua area,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1, 149-163, 1983 包含多张涵盖整个汉语北方话语音特征的方言地图。她使用的材料包括雅洪托夫教授在北大时收集的 50 年代末方言普查时的罕见资料和 M.B. Софронов 教授带来的台湾出版的材料。原来她用彩色笔手画高密度的地图，桥本先生看到以后收载在他主编的杂志。她在 80 年代由于她先生是苏联报社驻东京记者，一直居住在东京。从 82 年开始我和古屋昭弘、太田斋、柯理思等常结伴到她家开小小的研究会。她随时给大家介绍苏联中国语言学的最新动态，当然涉及到她的老师雅洪托夫教授研究的时候也很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及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访谈与咨询”网页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有她的访谈录，俄文版和中文版。菅野裕臣先生翻译成日语，登载在《日本ドゥンガン研究会报》2: 41-62, 2013 年。）

桥本万太郎先生的 Linguistic diffusion of Chinese 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2): 247-300, 1983;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7: 1-51, 1984; 《古代汉语声调调值构拟的尝试及其涵义》《语言学论丛》16: 47-98, 1991 年所使用的山西、陕西等方言调值资料也根据 Завьялова 女士提供的雅洪托夫教授早年收集的材料。

雅洪托夫教授自己利用那些资料的研究有：(1967a)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диалект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 Сер.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ып. 1: 76-82.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1980c) Пекинск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XI в., *Разыскания по общему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35-40. 《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汉译收在《汉语史论集》)。黎新第(1991)《北纬 37° 以南的古 -k 韵尾字与二合元音》，《语言研究》1991(2): 96-106 等一些论文根据更多资料讨论(1980c) 提出的北京话语音的重要标准。我本人也在《元代音研究》用过这个标准。